



加快推进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

□ 房 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近年来，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各国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和军事领域，更体现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这一战略举措，从国家层面进行关键领域的超前规划和资源配置，以培养未来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升级和国家长远发展。

立足国家战略高度， 推动急需学科专业的超常布局

“超常布局”是指国家在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中，针对国家战略需求进行的非传统、加速性的部署。通常涉及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学科建设、增强人才培养等方式，以此推动这些学科迅速发展，赶超国际水平。“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作为国家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及创新人才匮乏挑战的关键战略，其核心在于精准布局与资源集中配置，突破国家在关键技术及高端人才方面的瓶颈，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这一布局旨在加速培养国家急需领域的高端科技人才，具有“靶向性”。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和科技封锁限制，我国在许多高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核心原因在于人才和技术积累不足。通过超常布局急需学科

专业，实现在重要的、具有“国家科技”特征的特定领域精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其次，对国家急需学科专业的超常布局服务于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需求，具有“及时性”。我国经济正在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的关键窗口期，这高度依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核心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材料、能源与环境等新兴领域，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在这一特定窗口期涌现，才能确保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过程顺利进行。

最后，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是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引领性”。教育为一切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源头活水”，通过在急需学科专业领域实施超常布局，国家将推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人才培养和科技攻关，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工作打好基础、开好头。

聚焦关键领域发展， 应对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的现实挑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国家急需学科专业的布局和人才培养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体系、资源配置以及师资队伍建设和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高校的创新能力，也与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存在脱节。

首先，学科设置往往滞后于国家战略需求。高校未能及时将国家急需的学科专业纳入培养计划，导致学科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差距。部分高校在设置新学科时缺乏前瞻性和创新性，仅仅是对现有学科的简单复制或微调，导致人才供需错位，无法及时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迫切需求。

其次，人才培养体系存在学科壁垒与创新性不足。现行的高校人才培养体

系仍然过于强调学科的纵向发展，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培养机制还不够健全。特别是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更多集中于基础知识传授，而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和前沿科技的开拓能力关注不足。这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对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人才的需求。

再次，急需学科专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不够。传统优势学科常获得更多资源，而急需学科专业虽承担科技创新重任，却常因资金匮乏而发展受限。这种不均衡不仅阻碍急需学科专业快速发展，还可能导致学科结构失衡。此外，政策支持也有所欠缺，部分政策过于偏重传统学科，且现有评估体系难以全面反映急需学科专业的价值。

最后，新兴学科专业的教师队伍建设不足。尤其是在前沿科技学科，教师队伍的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学科发展的需求。具备国际视野、掌握前沿科技的高水平教师稀缺，影响了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和学生的培养质量，急需通过更有力的措施引进和培养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水平教师。

强化协同创新机制， 推动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的持续深化

推进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的持续深化，必须注重各方协同、整体联动与系统推进，统筹协调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的创新机制。国家急需学科专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与前瞻性，强化协同创新机制的核心在于整合多方资源，理顺各项举措间的关联性，补齐短板，提升整体效能。

一是优化学科设置，紧跟国家战略需求。政府与高校应共同开展定期战略前瞻工作，提前布局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学科专业。高校应结合国家战略、全球科技进展及产业需求，定期调整学科结构。同时，应鼓励高校形成特定学科跨校培养机制，打造国家的一流学科建设能力。

二是改革人才培养体系，打破学科

壁垒。鼓励高校改革课程设置，推动跨学科教学模式普及。建立灵活学分制度，允许学生跨院系、跨学校选修课程，培养复合型、跨学科人才。推动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增加实践性课程与项目，建立“问题导向型”课程体系，在国家急需领域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实践，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是调整资源分配，加大对急需学科专业的支持。设立专项拨款，加大科研经费支持，确保这些学科专业在实验设施与研究项目上拥有充足资源。建立科研配套基金，鼓励企业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形成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应对急需学科专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政策上给予急需学科专业更大支持，优先安排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审批与成果转化，实施专项激励政策，鼓励师生深耕这些学科，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四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急需学科专业教学质量。设立“急需学科专业高端人才计划”，通过全球招募吸引高水平学者加入教师队伍。设立高水平教师培训项目，特别是针对新兴学科专业和前沿科技领域的教师开展定期培训与国际交流互访，以长训短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急需学科专业教师水平，确保教师紧跟全球科技发展的步伐，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

时代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纵观世界发展大势，未来将属于那些能够掌握先进科技、引领创新潮流的国家，更将青睐那些不畏艰难、勇于破局、持续探索的开拓者们。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是中国面向未来、谋划长远的关键举措。通过精准布局与协同创新，为国家经济转型、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战略举措不仅展示了中国在科技自立自强上的坚定决心，更彰显了我国引领未来、开拓新局的魄力，必将对我国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教育部一体化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一座拥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天津古文化街正是这个现代化大都市悠远历史的一个见证。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考察时专程前往古文化街调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天津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十分重视，2019年他在考察天津梁启超旧居时就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天津深入发掘市辖区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现代化都市发展中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津味”城市文化新地标，进一步彰显天津的现代化新风貌。

津门故里，历史遗珠

城市不是建出来的，也不是拆出来的，而是长起来的。海河如一股甘甜的乳汁，滋养着天津这颗渤海之滨的璀璨明珠，而坐落子河岸的天津古文化街好似一颗历史遗珠，大浪淘沙，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向后人讲述着天津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天津古文化街位于天津老城东门外的海河西岸，自西向东由老铁桥大街和水阁大街联结而成，早在1404年天津卫建立之前就已形成，是天津文化的发祥地，被誉为“津门故里”。整条街长687米，街区建筑是参照原古建筑风格新建的仿古砖木结构，是目前天津市最大的一处仿古建筑群。在众多仿古建筑环抱之中，有一座历经698年风霜的古庙，它原名“天妃宫”，后改称“天后宫”。天后即妈祖，是我国沿海一带信奉的护航海神。元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统治者为了祈求海运平安，在海运漕粮必经的“舟车攸会，聚落始繁”的海津镇（今天津）建造天后宫。天后宫是天津市最古老的建筑之一，直至今日，依旧流传着“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俗语。以天后宫为界，天津古文化街被分为官北大街、官南大街，南北街口各有一座牌楼，分别挂有“津门故里”和“沽上艺苑”的牌匾。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民风民俗就是保存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和血脉。

沽上艺苑，文化瑰丽

九河下梢、合流入海的地理特征，孕育了天津独具特色的“河”“海”兼备的文化特质。天津古文化街浓缩着天津的历史与民俗，是津沽地区最早的经济、文化、商贸聚集地，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城市文化脉络中的璀璨瑰宝。天津的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苑中的一朵奇葩。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格局是以天后宫为核心，以袜子胡同、大狮子胡同等东西向街巷构成鱼骨状空间格局。古街上商铺、摊点星罗棋布，在红砖绿瓦的街道两旁林立着传承几百年的老字号店铺，在一个个门脸中承载着的是天津一件件文化瑰宝。沿街漫步，天津的历史人文和民俗文化尽收眼底。传统技艺方面，有大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的杨柳青年画，有神态各异惟妙惟肖的“泥人张”泥塑，有展翅高飞翱翔天际的“风筝魏”风筝等；传统美食方面，有皮薄馅大的“狗不理”包子，有酥脆可口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有酸香扑鼻的独流老醋等。传统曲艺方面，有天津“眼儿都”雅俗共赏的相声，有唱腔悠扬婉转的梅花大鼓，有曲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令人如醉如痴的天津时调等。每到春节等重要节令，古文化街即化身为欢乐的海洋，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扛箱、法鼓、竹马、旱船、中幡、宝辮等具有浓郁津门特色的各类非遗民俗文化活动表演、花会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天津古文化街凭借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体验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犹如一本立体隽永



感受现代化大都市中的津韵新潮

走进天津古文化街——

□ 李燕伶 刘福军

的“城市历史教科书”，以鲜活的传统商业生态和丰富的文化元素唤醒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并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传播中形成强有力的“文化磁场”，持续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年龄层的游客。天津古文化街映射出的是600多年天津卫的灵魂与底蕴，不仅是城市历史的舞台，更是现代化都市的重要精神标识。

古街津韵，海河新潮

古街传来阵阵吆喝声，海河卷起滚滚浪涛白。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积极推动古街区、古建筑的保护与开发，使故土乡愁有“乡”可寄，让地域文化有“根”可寻。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有机载体，通过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古建筑、特色商品及民俗活动，生动地展现出一座城市的历史人文风貌，是城市识别的一张文化“身份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调研时指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饱经沧桑的天津古文化街成为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范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就必须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开发利用和发展创新。天津古文化街最大的特色在于“旧”，厚重的历史记述着津门故里的岁月峥嵘往事，绵延着600多年津沽遗韵。天津古文化街最大的优势在于“新”，秉承新的发展理念，于保护中谋发展。天津古文化街破解了“千街一面”的城市古街区发展难题，造就了一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得益彰的古文化街，为沉寂的历史街区注入新的活力，延续新的故事，带来新的人气，使街区建筑“活起来”、历史故事“动起来”、津味文化“火起来”。

激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活力

□ 姚光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这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按照“国家急需、产教融合、供需适配”的原则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通过聚焦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学科融合，努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

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但我国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特别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必将面临大需求、迎来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受到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关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利好政策层出不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并把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举措，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舞台和发展空间。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下，各级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

是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的出台，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深化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筑牢了“四梁八柱”。我国职业教育从政府主体走向多元参与、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我国职业教育进入了大改革、大创新的时代。

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已进入攻坚时期，只有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才能激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活力。国家紧紧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提出了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建立部省协同推进机制为核心，设计了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同的改革新机制，着力营造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产教深度融合的新生态，引发了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热潮。各职业院校也在不断深化“三教”改革、“五育”并举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改革创新已成为职业教育的靓丽底色和活力之源。

伴随我国职业教育稳步快速发展，职业院校办学呈现出群雄逐鹿、千帆竞发的局面，职业院校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但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短，其生源质量、办学水平、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尚未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特征凸显的格局。由于职业教育契合产业发展不紧密，许多学校在培养目标、教学模式等方面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不强，类型特色不够鲜明。

随着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推进，更多资源向优质院校和特色专业倾

斜，势必引领职业院校的重新洗牌。“双高计划”比肩普通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是落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重要制度设计，坚持质量为先、改革导向、扶优扶强，重点支持就业率高、毕业生水平高、社会支持度高，校企合作好、实训开展好、“三教”质量好的学校。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各个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影响力将会拉开较大差距。因此，那些善于抓住政策机遇、办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职业院校将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相对普通高等教育而言，职业教育具有更为强烈、更为鲜明的开放性。职业院校必须坚持开放办学，强化国内外开放合作，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贡献度和影响力。近年来，我国职业院校在开放办学过程中，一方面加强深化与政府、企业、学校、行业之间的合作，形成了多元主体深度融合的协同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形成了国内外交流融合的办学格局，增强了办学活力，拓宽了办学空间。没有开放与合作，职业教育就没有出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以往实践基础上，创造性提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一体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契合点。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产业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要为首要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就必须进一步打开视野、拓宽思路，主动与不同教育要素开放重组、与各类产业要素和创新要

素互动融合，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赋能已经成为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更是职业院校实现转型升级式发展的重要契机。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和全面推广，对于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能力、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促进产业数字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放大、叠加、倍增和持续溢出效应。虚实结合的新型个性化育人空间、各类教育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全员参与的数据治理等，为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职业教育的社会化服务、学校的数字化治理、终身学习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全新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服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升级的要求，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与均衡发展，积极探索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新规律，促进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全面服务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服务终身学习型社会，实现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支撑引领职业教育迈向现代化。

（作者系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院长）

